

華人陽／陰默認文化與社會工作規則 倫理實踐之困境

白倩如、何振宇

壹、前言：將專業倫理置回實踐 脈絡之必要性

社會工作專業興起於英美工業革命引發的現代化（註1）（modernization）背景下，透過西方文明對非西方文明的文化傳播後，逐漸形成全球現代社會福利體系的專門化制度。社會工作自有一套專業目標、價值與倫理守則，指引專業人員之行動——不僅知道「要做什麼」、「如何做」，也必須知道「為何要做」。專業行動正當性之（legitimacy）一部分來自知識理論體系，另一部分則來自於專業價值系統（Siporin, 1975）。也可以說，社會工作者不僅是一個技術理性的行動者（technical-rational actor），更是一個道德實踐者（practical-moral actor）。臺灣社會工作在引進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與方法等知識體系的同時，亦引進專業價值目標體系和倫理守則（ethic codes）等一

系列專業「行規」。在歷經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倡議與政策立法建置後，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認可，同時亦形成蓬勃的專業社群（包含公會、工會、學會、協會與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等）。然而，移植自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與價值體系中，有許多華人文化從未出現的詞語概念，諸如：福利、公民、正義、平等、權利等（梁治平，2011）。另一方面，華人社會文化中常見的詞語概念，如：仁、義、公道、孝、大同等等，則甚少被學術研究領域青睞，也鮮少見諸於正式的專業養成社會工作教科書中。談及華人傳統價值觀，甚至可能被視為過時或是「文化復辟」。

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倫理議題的討論思維主要是將西方社會工作倫理規範和相關語彙，直接套用在實務現象場中。有關專業倫理問題與倫理難題的決策衡量上，主要是依循規則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之相關倫理原則與倫

理守則，用以約束專業人員的行動具備正當性與合適性。規則倫理的討論焦點是倫理行動，有具體的是非善惡規則，及規則背後相應之系統性倫理哲學原則，強調倫理決策是經過排列優先順序後依原則而行動，如尊重自我決定或促進福祉，亦即「原則為本（principle based）」之取向（莎拉·班克斯，2014）。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與常用之倫理難題決策原則，均屬於原則為本之規則倫理範疇。從西方社會的角度來看，人權和社會正義等專業價值信念與專業服務間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對非西方世界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則必須要放置入日常社會運作的具體情境中，才可能獲得意義內涵和行動可能性的討論（Hugman, 2013）。規則倫理被社會工作主要引用之倫理哲學包括義務論、效益論與激進論，三者均是形成於西方個人主義與契約文化之社會制度基礎上，假設個體具有充分之決策理性與自主性；這與華人關係主義與人情文化之社會本質有根本差異。規則倫理不考慮倫理行動者（actor）、倫理實踐情境與文化等影響因素也不斷受到質疑（莎拉·班克斯，2014）。

作為一門實踐為本專業（practice-based profession），社會工作者對實務實踐場域之文化屬性必須要有深度理解，無法置身事外。本文認為在討論臺灣社會工作倫理實踐困境時，首先要將之置回所屬

社會的文化脈絡進行理解。就像是若我們要瞭解施工人員為何總是無法按照設計圖樣的規畫和原則施作時，就應進入施工現場，了解施工者與所屬組織的行事邏輯，才可能獲得意義。鄒川雄（1999，2000）提出華人社會體制是「陽／陰二重性」的設計，陽層面為公開場合或正式體制，陰層面則是私下場合或非正式體制；在陽／陰層面之間存在許多模糊的間隙化空間，故個人可以透過「陽奉陰違」和「拿捏分寸」的社會行動邏輯，使陽／陰二個層面可以同時合理併行存在，成為「禮教文化」與「謀略文化」互為表裡，且名實得以隨時分離的社會。這也展現在我們社會生活中，隨處可見「說一套／做一套」、「檯面上一套／背後一套」之現象。本文認為專業倫理規則實踐困境應加入文化分析視角，透過分析華人社會陽／陰默認文化之社會制度本質，觀察社會工作者作為社會集體文化之一員，面對之專業倫理規則實踐困境，方可能認識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知行落差」之真實樣貌，並逐步達成實踐專業價值理想。

貳、華人社會之陽／陰默認文化——制度設計及其運作

文化作為支配人類生活的經驗之物，既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系統，也具體展現在可見的器物 and 不可見的人造物中（Newman

et al., 2019)。格爾茨(2009)將文化視為一個符號學的概念，認為文化就是人們自己編織且生活於其中的「意義之網」。依據 Huntington (1996)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對文明的分類，西方文明是由歐美或北大西洋組成，而非西方文明則含括了中國、日本、印度、伊斯蘭、拉丁美洲與非洲文明等六大文明。其中，東亞儒家社會是指共享儒家文化、以華人為主要組成民族的東亞國家，包括臺灣、新加坡、中國、港澳等地區。當然這些地區也隨著各自的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在共同的文化特徵中有各自獨特之樣貌。文化類型是人們選擇的結果，這種選擇不僅表明了人們的好惡，而且表明了他們關於生活意義的思考；而任何正式的社會規範，如律法，均是根植於特定「文化式樣」中，反映該社會文化特定之「法的精神」立場(梁治平，2011)。也可以說，社會制度並不只是維持社會秩序運作與解決衝突的工具或手段，同時也是傳達特定人群價值追求的意義符號(梁治平，2011)。當前在討論華人文化與社會工作倫理關係時，或是聚焦在差序格局下的尊尊原則與親親原則，以及對華人社會工作者在決策和資源分配與程序正義上的影響(曾華源等人，2021)，抑或是聚焦在社會工作者與案主雙方關係網對雙方專業關係之影響上(白

倩如，2020)。然而，這些觀察大多聚焦在社會工作者與案主的二人關係之間，屬於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y)之範疇；但是如果理解一個正式制度的推動和落實，則必須從梳理整體華人社會制度的鉅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角度著手。

一、陽／陰默認體制中華人行事邏輯——「陽奉陰違」(註2)與「拿捏分寸」

西方文化強調個人具自由意志、人人平等，人際交往立基於彼此的共同興趣、利益、經驗，親密與信任是隨著交往深度所建立之情感關係；華人社會的個人則是鑲嵌於各自的關係網(guanxi network)之中，由先賦關係與後天建構關係交織形成，互動規範決定於差序關係中的既定身分及其對應的人際互動規範(黃光國，1993，1988)。華人文化受佛釋道儒四派哲學影響；儒家主張的倫理在本質上是一種「地位倫理」(status ethics)，對於庶人和士有不同的倫理要求；且有其獨特的宇宙論、天命觀、心性論和修養論，整體結構構成理解儒家「仁義禮」倫理體系的「背景境域」(黃光國，1988)。鄒川雄(1999，2000)提出，華人社會的日常生活基本構成是「陽／陰二重性」；在陽的層面(即公開場合或正式體制)，名、公、義、經、禮等為社會秩序奠立基礎；但在陰的層面(即私下場合或非正式體

制），人們在這個模糊空間中拿捏權衡，形成名實分離、公私不分及權宜權變的結果。陽／陰二重性的秩序體制使華人社會成為「禮教文化」與「謀略文化」互為表裡，且名實得以隨時分離的社會。人們的日常行動在其中充滿彈性與空隙，在「公開／私下」或「外表／內在」之間展現出的不一致，在陽／陰默認雙重性同時存在的體制設計下，成為理所當然。因此，「拿捏分寸」與「陽奉陰違」是華人思維和行動的基本模式，這是在陽／陰默認體

制中產生運作的。首先，拿捏分寸是華人典型思維模式，具有衡量全局、直觀體悟，以及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制宜之特點，以尋求自身與外環境的合宜關係。在宗法差序倫理和皇權政治倫理相生相剋的關係中，心照不宣的「陽／陰默認體制」被人們建構出來。在陽／陰的默認體制中，傳統華人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實行場域（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際互動場域），表現出陽陰違的行事邏輯（表1）。

表1 華人陽／陰默認文化下的行事邏輯

日常生活的場域		陽	陰
政治場域	包容政治	仁義道德政治	利益包容分贓
	胥吏政治	文官體系	胥吏暗盤管理
	朋黨政治	共識與團結	派系合縱連橫
法律場域	衝突解決	國法公斷	私下調解
	行法之道	立法從嚴	私下調解
經濟場域	財經政策	保守與均衡	行會自治
性的場域	性態度	性禁忌與性壓抑	和諧且自然的事
	色情文藝	官方查禁	民間興盛
文化場域	文化詮釋	論述形式的典型化與規格化	詮釋的流動性與創造性
	變法改革	託古	改制
	知識庫	正統學術體系	民間信仰體系
人際場域	人際互動	面子文化	人情法則
	關係界定	外人	自己人
個人場域	自我認同	公己	私己
	社會化	理想的社會化	現實的社會化
	做人處事	外圓	內方

資料來源：引自鄒川雄（2000，頁170）。

目前臺灣已有部分實證研究開始關注在陽／陰默認體制下，個人處理生活事務與擔任社會角色時的行事邏輯。例如，李森興（2014）針對苗栗地區民眾面對租屋糾紛和車禍事故衝突處理解決之行為和思維發現，民眾會對有調解服務口碑的民意代表有較高的信任度，認為有助於達成和解；當正式規則清晰時，民眾經常動用面子、紅包與人情，當正式規則模糊時，某些人會藉故拖延或打模糊仗，但這樣的行為不見得有利於談判結果。又如，高旭繁（2013）的研究發現，華人在「角色義務」（註3）及「獨立自主」（註4）兩類情境下，順應情境、順勢而為（亦即見機行事）的效應均高於忠於自我。此外，余德慧（1999）針對華人行事倫理的分析也發現，臺灣庶民社會之運作有許多彼此熟知的規則，例如，在地方基層選舉中，在地鄉民彼此的行動都相當顧及對方的「面子」、避免因為選舉而「撕破臉」，故而會選擇隱藏自己的真實態度，以確保人際安全閥不會受到影響。這些陰層面的文化行為運作，與正式律法規範同時存在。

二、潛規則——人情與律法的調和的灰色地帶

有人說華人是「不守規矩的民族」，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較為精確的描述應該是在陽層面，華人會宣稱堅定遵循正式規則，但在陰層面，並非無序，而是

另有一套特定群體內部（自己人）才會知道的「潛規則」（hidden rules）。潛規則是指：（一）人們私下認可的行為約束；（二）這種行為約束，依據當事各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在具體的社會互動中自發生成，可以使互動各方的衝突減少，交易成本降低；（三）所謂約束，就是行為越界必將招致報復，對這種利害後果的共識，強化了互動各方對彼此行為的穩定預期；（四）這種在實際上得到遵從的規矩，背離了正義觀念或正式制度的規定，侵犯了主流意識形態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隱蔽的形式存在，當事人對隱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確的認可；（五）通過這種隱蔽，當事人將正式規則的利益代理人遮罩於局部互動之外，或者，將代理人拉入私下交易之中，憑著這種私下的規則替換，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吳思，2009，頁21-22）。林煒雙等人（2010）訪問在職公務人員後，歸納出組織行為運作中潛規則之影響構面，包括：（一）領導因素；（二）組織文化；（三）群體壓力；（四）傳統文化；（五）組織制度；（六）社會背景；（七）個人利益驅動；（八）工作效率；（九）個人發展；（十）人際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認為潛規則可能有利於單位運作和人員磨合、促進業務聯繫和訊息獲取，彌補正式制度中不足的資訊和支持；不過，當潛規則凌駕於正式制度的運

作，而引發不公平的心理感受時，也可能使個人出現被動適應；例如，不要強出頭、不說領導壞話、要盡量迴避涉及政策問題的場合、拉關係好辦事、不遵守潛規則事情就很難辦等影響。

陳成宏（2011）歸納，在教育行政體系常見的潛規則運作型態包括：（一）排資論輩；（二）輪流抽籤；（三）人情關係；（四）利益交換；（五）陽奉陰違。對華人來說，要學會在不同的情境中判斷應該優先遵從正式規範或是潛規則，以及辨識規範的最終解釋權在「誰」手上。生活在這種因人而異的規則詮釋文化中（即便不了解也會逐漸被社會化），多數華人也相當務實的依據互動對象調整自己的互動姿態，因時因地因人「審時度勢」，並決定要優先依循哪一套規則行事，畢竟「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彼此心知肚明，且心中各有「一把尺」，但絕少會說破這種陰陽兩面的事實。曾仕強（2017）即指出，在道德衡量上，華人傾向採用多重衡量標準，合理性優先於合法性，合理的標準則可以依據對象關係親疏與各種標準而彈性變動。李森興（2014）的研究發現，在車禍與租賃衝突調解中，潛規則與參照系統接近習慣法效力，具有降低談判的社會成本的功能。余一鳴（2012）的研究則發現，軍事社會化程度和情境對道德疏離有交互作用效果，且此種效果是由於道德判斷的差異所引起，在戰時情境下軍

校生以結果論作為道德判斷的基礎，故而有較強的道德疏離傾向；在平時的情境下則回歸以義務論為原則的道德判斷，因此道德疏離傾向較弱。

參、社會工作規則倫理在華人陽／陰默認文化中的實踐困境

一、社會工作規則倫理之哲學內涵

目前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在正式制度設計和教學內容，仍然是以規則倫理為主。規則倫理主要被社會工作引用的倫理原則有三：（一）義務論；（二）效益論；（三）激進論。首先，義務論的基礎假設是「人為自由個體」，其基本倫理原則是尊重個人。義務論的相關倫理原則，較大程度受到臺灣社會工作者的認識，最常被運用在正式會議或考試中，作為是否違反倫理規則的判斷依據。義務論在社會工作衍生出的相關倫理原則有二，個人自由與正義，對應之規則有五：（一）服務使用者之自決；（二）非判斷主義；（三）保密；（四）平等；（五）尊重服務使用者之權利。1960-1970年間，經常採用Biestek的六項個案工作原則（個別化、目的性的情感表達、控制情感投入、接納、不待批判的態度、服務使用者的自我決定、保密），即可視為義務論對於尊重每個具有自我決定能力之人類的概念展現（引自莎拉·班克斯，2014）。其

次，效益論之基礎假設是「人類為自由個體，但社會之自由有其限制」，其基本倫理原則亦是尊重個人。在社會工作衍生出的相關倫理原則有二，正義與效益，對應之規則有三：（一）無差別待遇；（二）促進服務使用者之福利；（三）促進公眾利益。第三，激進論的基礎假設是「尊重人類為社會存在體」。在社會工作衍生出的相關倫理原則有二，正義與效益，對應之規則有六：（一）物質之重分配；（二）挑戰不公；（三）追求社會變遷；（四）眾人與個人之彰權；（五）挑戰不公；（六）追求社會變遷。針對上述倫理原則（principle），衍生出一系列的倫理守則，倫理決策則是經過排列優先順序後依原則行動（莎拉·班克斯，2014）。

1948年聯合國人權宣言之「普世」倫理原則中反映之特定西方文化思維，一直受到批評，特別是國際社會工作倫理宣言的部分，並未反應出其他國家的文化規範與信仰（莎拉·班克斯，2014；Hugman, 2013）。西方的道德思維是以「正義」為基礎的義務與紀律，華人的道德思維則是以「人倫」為基礎的積極意義（吳明燁，2009）。西方包括Durkheim與Kohlberg的理論在內，獨尊「理性」的普遍原則，講求公私分明的紀律，並且刻意排除私人感情作用。但是這一套以「公德」為核心的道德信念，移植到華人社會卻不十分合適。華人文化之道德信念並不是「正義

原則」之下的一視同仁，反而是有著「為誰著想」考量的「利他原則」（楊中芳，2001；葉紹國，1996）。華人總是先實踐「私德」，再視能力向「公」邁進；華人傾向將社會正義觀所追求的「公德」歸為「消極義務」（或稱為消極性的道德），家庭倫理觀的道德則重視家人與親人之間的「積極義務」；雖非排除個人對公領域的「消極義務」，但卻是將之放在較為次要的地位（吳明燁、周玉慧，2009；黃光國，1998）。對華人來說，消極與積極的區別並非以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為劃分基礎，「為誰著想」與「為誰負責」才是主要的考量（楊中芳，2001）。此外，原則為本的倫理是將倫理推理與決策視為理性的過程，不考量情境和道德行動者本身可能的影響因素，此一設計忽略了個人在執行專業角色的場域複雜度，會直接影響個人道德認知判斷之事實（莎拉·班克斯，2014）。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1980年代在檢討社會工作專業倫理時，原則為本倫理的「條列式取向（list approach）」一直受到批評。特別是Biestek的設計，比較傾向聚焦在有效率的個案工作關係原則，僅關注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二人關係；亦即社會工作者該怎麼對待個別服務對象，其關注的核心是個人權利與自由，而非社會正義與責任（引自莎拉·班克斯，2014）。社會工作專業養成訓練上

強調，專業人員即便無法完全做到價值中立，也應該盡量減少價值介入的程度。因為從實證論的思維設計來看，所有涉及價值層面的事項都是由服務對象自己決定，社會工作者只是根據這些決定提供事實層面的分析和解決辦法，在此行動邏輯下，社會工作者得以確保價值中立（value-neutral）（阮新邦，2005）。從實證論的角度來看，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社會工作等學術領域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是一種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但在道德價值領域中，理論與實踐並沒有必然關係，事實層面上的澄清也不能保證一定可以解決價值上的衝突（阮新邦，2005）。不過，涉及行為或現象意義層面的理解並不僅止於因果關係的辨識，還必須將社會行為與其相關的文化傳統價值與規範聯繫起來，才可能掌握深層意義（Weber, 1949）。因此，在形成問題意識時，必須回到本土社會生活體驗事實作為出發，從日常生活中感受最深的具體問題做為起點，才能避免落入形式主義的謬誤（黃光國，1993）。

二、華人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實踐的陽／陰兩面性——一些非正式的觀察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在日常生活中，習焉而不察、日用而不自知的陽／陰默認文化，對於華人行動思維邏輯影響是全面性的，包括對人際關係的建立／運作

／維護上，講求多重關係互賴、禮尚往來的關係網建立，衝突處理講求表面和諧不可計較，但私底下利益的計算要平衡，以及信任建立受到身分和關係遠近影響等等。從實務現場觀察可以發現，臺灣社會工作者面對不少「知而不能行」或「說一套做一套」的「文化－倫理衝突困境」（cultural-ethics dilemma），舉凡資源分配受親親原則影響、專業決策受尊尊原則影響、關係建立／維護／平衡等等，均受一系列文化慣習左右（白倩如，2020）。此外，要直接將專業倫理規則直接套用在案主系統和行動系統中（甚至要對方「理解」自己的專業規範），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尤為關鍵的是，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原則相當強調尊重個人自主性，故而在服務目標上就明確要求社會工作者應最大程度尊重個人的自我決定，以及保持價值中立。然而，要能夠真正「做到」，不能是社會工作者一廂情願，還必須互動對象也能夠理解和認可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

Yip（2004）指出香港與大陸地區的華人服務使用者，更傾向遵循「專家」的直接建議或指導，且建議內容必須是符合某些特定文化價值觀的「正確」的建議，只依賴專家角色的權威性其實並不足夠。這與個人在社區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觀察是一致的，懂得運用諸如「家和萬事興」、「打某豬狗牛」這類文化語言，更容易達成理解和遵從效果。又例如，歐

愛玲（2013）針對移居印度的客家人家庭企業的人類學研究也發現，要想能夠與緊密封閉的華人社區建立關係，不僅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社區身分、懂得運用節慶時機帶著禮物拜訪、對互動意圖坦誠的解釋，還要適當創造和讓對方能夠幫助自己的機會，並表達感激等等，均是建立關係和獲取信任的重要作法；當對方是「不值得信賴」的陌生人和外人時，華人會認為沒有必要表現過多的熱情而僅會做表淺的禮貌互動，但隨著關係的深入，好客的民族精神成為一種驕傲，甚至會願意「做更多」和「說更多」。除此之外，在晚明動亂時期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時，某些地方菁英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社會秩序，開始了「經邦治國」的實踐，例如，立鄉約、組織地方救濟、倡導照顧孤貧的善會，以及管理地方公共工程等作法（包筠雅，2021）。這些現象也反映在臺灣的地方社區與民間慈善組織中，而與社會工作專業組織呈現樣態不一的競合關係。

面對社會工作規則倫理在實務現場的執行困境，國內社會工作學術之本土研究卻不多。相關文獻仍然是依循西方專業倫理哲學語境形成的規則倫理，進行倫理問題的辨識和難題決策。但在實務工作上，則出現許多轉化性的作法。對於無法遵守專業社群規則共識的情形，或是簡化為「違反專業倫理」，或是檢討本土專業體制建置不夠完備，抑或是將其隱藏於檯面

下處置。一種歷經「雙重變形」（註5）、「像西方又不像西方」的臺灣本土社會工作專業樣態於焉形成。相關現象觀察可以概略分為二大類：（一）公開報告（陽）／實務操作（陰）——「能做不能說」／「能說不能做」，諸如：協助安置寄養少與寄養父母維持關係，甚至到成年以後、稱安置照顧者為「**爸／媽」、將資源優先分配給經常「配合」機構活動的服務對象，以及接受服務對象致贈農作物給社工表達感謝等等，這類均與評鑑或公開報告（陽面）與實際運作（陰面）之間存在落差的情況；（二）專業實踐（陽）／私人生活（陰）——「說一套／做一套」、「公開一套／私下一套」，諸如：自己平常做的、要求服務對象不可以做（如：遇到困難請托熟人、或諮詢私人網絡、求神問卜或參加宗教儀式）、私下拜託熟人或託人關說以獲取資源、期望熟識對象可以偏私等等。同樣的，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在陽面也是持續努力建立制度、積極討論倫理輔導專業機制或辦理各種教育訓練課程等等，但陰面可能更多抱怨、使倫理事件或潛在問題更多轉向檯面下處理。尤為關鍵的是，相關倫理教育訓練與審議制度，大多並不會涵蓋在陰面擁有最終決定權和規則解釋權者。長此以往，可能會使基層工作者感覺陰面的潛規則的實質力量凌駕於正式規則之上；甚至規則化之後的倫理精神，反而可能成為優勢方合理化不道德

行為的保護傘。不論如何，出現這樣的文
化與社會制度涵融變形的結果並不令人意
外；但這些現象也不應被簡化為「違反倫
理規則」或只是歸因於社會工作者個人的
反思、反身和道德實踐勇氣議題，而
必須將社會工作者的倫理實踐行動同時
置回日常實踐行動的脈絡中，才能獲得
完整的理解。

肆、加入華人陽／陰默認的文化 視角思考社會工作專業倫理 實踐

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情境系統是由一
系列各自相互獨立且競爭的行動規範組
成，而這些行為規範又是包覆在整體社會
文化之中；社會福利法規、組織機構規範
與專業社群的倫理守則如何被解讀、如何
裁量、何者優先與應如何行動才是適當等
等議題，均無法脫離整體社會文化規範及
人際互動之文化規則（白倩如，2020）。
本文主張，在分析倫理實踐困境相關議題
時，應「戴上陽／陰默認的文化眼鏡」進
行觀察分析：

一、事件牽涉的各方利害相關人及其社會
關係網之觀察分析，包括：利害相關
人過去是否為舊識？關係網之中是否
有重要第三人？社會地位如何？彼此
有無恩怨？或是政治價值立場對
立等利害衝突？

二、服務對象的生活關係網為何？家人和
熟人在這個倫理議題中對其決定的影
響力和實質作用（正負面）為何？
是否有宗教信仰等正式或非正式力量
影響？以及宗教可能對案主在處置方
式與目標的影響和運用（林勝義，
2014）。

三、利害相關人的目標衡量，包括：服務
對象的最終權益底線是什麼？誰會為
其爭取？服務對象對於爭取權益的
態度有多強烈？基於何種價值觀？社
會工作者對其價值觀的認同程度有多
高？可能雙贏嗎？還是可能「和諧」
優先或為了「顧全大局」，而犧牲
弱勢者？又或者是能夠考量案主權
益優先？

四、在整個「陽面」的運作程序中，可能
存在的規則模糊和程序模糊空間為
何？誰擁有在這個過程中的最終解釋
權？這個人可能考量什麼？

五、社會工作者爭取或維護服務對象權益
之倫理「底線」為何？要維護此一
「底線」可能需付出的個人代價為
何？包括：工作時間、其他服務對象
時間的排擠、個人職涯等等。又，手
上有多少磋商的可用籌碼（包括：熟
人、人情和正式權力等等）？彼此有
無人情包袱？

六、在整個倫理事件與程序中，資訊不對
稱與權力不對稱的情況為何？可能導

致誤判或資訊不全的主要資訊壁壘來源是什麼？可能突破嗎？管道是什麼？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處境與交易代價又是什麼？

七、在涉及倫理決策的事件中，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應涵蓋的範疇（客觀證據和具體服務）是否有被指認清楚？欲處理之主要議題是否涉及特定的文化風俗習慣？文化價值在決策時會優先考慮之價值系統為何？

伍、代結語——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實踐需要「文化意識覺醒」

專業本土化其中一項重要構成即是專業倫理的本土化。尤為關鍵的是，文化慣習不僅影響服務對象，也實實在在地影響專業人員。專業人員應覺察文化慣習對個人實踐專業倫理的內在行動邏輯之影響力。雖然承認和尊重多元文化是社會工作專業耳熟能詳的核心價值，但其實只有少數國際社會工作專業社群發展出具體聲明。例如，紐西蘭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Aotearoa-New Zealand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ZASW）於2008年提出之倫理守則（*ANZASW Code of Ethics*），即是以毛利語和英語兩種文字版本寫成，並明確承認原住民族毛利人作為服務使用者與專業社群成員之價值與倫理影響，

並要求社會工作者要認識國家獨特的雙文化（bi-culture）歷史，尋找與不同文化群體成員的適當工作方式，發展超越單一文化觀的社會工作理論、實踐與制度（Hugman, 2013）。社會工作專業要能夠發展出可被遵循、可受公評的專業倫理主張，方可能使專業獲得社會之尊重和認可，而這必須是建立在社會共同認可的道德文化共識之上。此外，華人陽／陰默認文化與潛規則，在當前臺灣社會福利組織委外聘僱制度、碎片化的服務輸送系統，可能加劇了社工的文化——倫理困境：尤其是社會工作者不僅要面對各方利害相關人的差異期望和利害衝突，更要面對鑲嵌在利害關係人背後，有關人情關係網絡文化規範的壓力（如：不懂人情世故、不會做人……等指責）。本文認為，社會工作專業亦應積極鼓勵專業社群基層活動之觀察、案例討論和研究等「反映事實的」本土案例之討論，以對華人陽／陰默認文化倫理困境的「陰面」處理過程，以及職場潛規則運作影響事實能有更多的認識，並以朝向發展適合臺灣本土社會工作實踐文化脈絡之倫理守則為目標。此外，不能忽視領導者的德性倫理（上樑不正下樑歪）與專業人員的道德勇氣，並應考慮發展專業人員間討論倫理文化實踐困境議題之支持機制和專業氛圍。最後，避免只是設定更多「陽面」的行政規定和書面作業，反而忘記社會工作專業維護案主利益的專業

使命與角色職責，而陷入徒然流於形式之憾事。

教授與曾華源教授於會議中給予的寶貴意見。

※致謝：本文曾以〈從規則倫理到情境倫理——華人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實踐之轉移〉為題，摘要發表於「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2021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四屆本土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學術研討會」，感謝施教裕副

（本文作者：白倩如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何振宇為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陽／陰默認文化、社會工作規則倫理、潛規則

註 釋

註1：「現代化」與「西化」（Westernization）不同，前者泛指21世紀源於西歐白種人的種族開拓與工業革命，後者則是指中國社會自晚清以來受西方文化，重新建立政治經濟福利社會制度的發展過程；必須注意的是「西方」也是一個泛稱，至少可以區分為古希臘、羅馬的東正教歐洲文化體系，與今日美加之基督新教二大文化體系（許倬雲，2008）。本文為便於討論，將以「西方」一詞作為統稱。

註2：此處的陽奉陰違是作為華人在陽／陰默認文化下的一種社會行動謀略，是鄒川雄（1999，2000）提出之學術性概念，與帶有「虛意應付」負面意涵之成語常識意涵不同。

註3：角色義務情境涵蓋遵從權威、孝親順長、以和為貴及行禮如儀等概念，亦即華人在某些情境下特別強調個體該扮演的角色及恪盡的義務。

註4：獨立自主情境則涵蓋直接表達、獨立自主、尊重個人的概念，亦即華人受西方文化影響之下，會在某些情境強調獨立及自主的概念。

註5：葉啟政（1999）指出，華人社會在歷經全面吸收西方知識話語體系與社會制度的現代化過程中，源自傳統的社會表徵多數時候並非全然消失，而是以「雙重變形」的姿態重新融合展現；一方面是弱勢社會傳統文化表徵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文化模式會有意或無意的做某種程度的調變，另一方面則是西方優勢文化面對原已深植的結構型態與傳統文化模式，往往無法以其在西方原產地的原有姿態一成不變也呈現出來，故而也會不可避免的「變了形」。

📖 參考文獻

- 包筠雅 (Brokaw, C. J.) (2021)。《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杜正貞、張林，譯)。上海人民。(原著出版年：1991)
- 白倩如 (2020)。《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實踐——困境與出路》。洪葉。
- 余一鳴 (2012)。〈「堅守原則」還是「入境隨俗」：情境與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效果〉。《教育心理學報》，44 (2)，229-251。http://doi.org/10.6251/BEP.20111104
- 余德慧 (1999)。〈中國人行事倫理的提升：尋找現代社會一個丟失的環節〉。載於戴良義 (編)，《人的素質 (1999) 論文集》(頁79-102)。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 吳明燁、周玉慧 (2009)。〈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社會依附的影響〉。《台灣社會學》，17，61-100。http://doi.org/10.6676/TS.2009.17.61
- 吳思 (2009)。《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究竟。
- 李森興 (2014)。《苗栗地區常民生活衝突解決模式之研究：以房屋租賃與交通事故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聯合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32hbvv
- 阮新邦 (2005)。〈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載於何芝君、麥萍施 (編)，《本質與典範——社會工作反思》(頁1-20)。八方。
- 林勝義 (2014)。《宗教與社會工作》。學富。
- 林煒雙、高騰、孫李銀、景懷斌 (2010)。〈作為組織政治行為的潛規則：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公共行政評論》，4，85-110、204。
- 格爾茨 (Geertz, C.) (2008)。《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原著出版年：1989)
- 高旭繁 (2013)。〈忠於自我或見機行事？華人關鍵情境下的行為差異〉。《本土心理學研究》，40，3-44。http://doi.org/10.6254/2013.40.3
- 莎拉·班克斯 (Banks, S.) (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四版)(周采薇，譯)。洪葉。(原著出版年：2012)
- 許倬雲 (2008)。《傳鐘回響：許倬雲先生臺大講學集》。國立臺灣大學。
- 陳成宏 (2011)。〈教育行政「潛規則」之理論探討與概念模式建構〉。《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9 (3)，121-159。http://doi.org/10.6151/CERQ.2011.1903.04
- 曾仕強 (2017)。《中國式思維》。北京聯合。
- 曾華源、胡慧嫻、白倩如、許雅喬、李仰慈 (202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社會脈絡下的倫理實踐》(四版)。洪葉。
- 黃光國 (1988)。《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巨流。

- 黃光國（1993）。〈互動論與社會交易：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本土心理學研究》，2，94-142。http://doi.org/10.6254/1993.2.94
- 黃光國（1998）。〈兩種道德：臺灣社會中道德思維研究的再詮釋〉。《本土心理學研究》，9，121-175。http://doi.org/10.6254/1998.9.121
- 楊中芳（2001）。《如何理解中國人：文化與個人論文集》。遠流。
- 梁治平（2011）。《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國立臺灣大學。
- 葉啟政（1999）。〈序〉。載於鄒川雄，《中國社會學理論：尺寸拿捏與陽奉陰違》（頁3-8）。洪葉。
- 葉紹國（1996）。〈道德推理中關懷導向與正義導向思考之區辨及其在中國社會實踐的特徵〉。《本土心理學研究》，5，264-311。http://doi.org/10.6254/1996.5.264
- 鄒川雄（1999）。《中國社會學理論：尺寸拿捏與陽奉陰違》。洪葉。
- 鄒川雄（2000）。《中國社會學實踐：陽奉陰違的中國人》。洪葉。
- 歐愛玲（Oxford, E.）（2013）。《血汗和麻將：一個海外華人社區的家庭與企業》（吳元珍，譯）。社會科學文獻。（原著出版年：1993）
- Hugman, R. (2013). *Culture, values and ethics in social work: Embracing diversity*. Routledge.
-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 Newman, D. M., O'Brien, J., & Robertson, M. (Eds.). (2019). *Soci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Readings* (11th ed.). SAGE.
- Siporin, M. (1975).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MacMillan.
- Weber, M. (1949).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M. Weber & E. Shil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50-112). Free Press.
- Yip, K. S. (2004). A Chinese cultural critique of the global qualifying standards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23(5), 597-612. http://doi.org/10.1080/0261547042000252316